

先秦秦汉的西南夷概念及其演变

段渝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在汉代及以后的文献中, 西南夷是指中国古代分布在青藏高原东缘巴蜀以西、以南和西南地区的古代族群, 即秦汉时期分布在今四川西南、西北和云南、贵州等地区属于氐羌系统和濮越系统的各个族群的总称, 南中只是指南夷中的主要族群。而巴、蜀在先秦时期也被认为属于南夷。不论在内涵还是在时空分布方面, 西南夷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是有所变化的。

关键词: 西南夷; 内涵; 时空; 先秦汉晋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西南夷是中国古代分布在西南地区的非华夏或非汉系的民族, 包括古代的氐羌和濮越两大民族系统, 它们是如今这一广阔地域内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和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先民。

濮越为上古时代中国南方的主要民族系统之一, 是今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先民。濮越的历史十分悠久, 因其分布甚广, 群落众多, 故称百濮, 或称百越。而历史上属于氐羌系统的族类, 是如今藏缅语族各族的先民, 如: 今甘、青、川交界处, 古代是西羌以及其后的党项羌, 现在是藏族; 岷江和大渡河上游, 古代是冉、駟及白狼、槃木、唐廆等, 现在是羌族和藏族中的嘉戎支; 沿大渡河及安宁河至滇东、黔西及昆明一带, 古代是笮都、嵩等部落, 或者是越嵩羌叟, 现在主要是彝族; 沿安宁河至大理一带, 古代是摩沙和昆明, 现在是纳西族、普米族和白族。据历史文献及本民族传说, 这些族体的历史均可上溯到氐羌。就语言的系属而言, 他们都是汉藏语系中藏缅语族之下的各族, 有着亲缘的关系。^[1]在中国南方, 古代民族的构成基本上就是濮越和氐羌两大民族系统。至今除苗瑶语系外, 中国南方仍以壮侗语族及藏缅语族的民族为主。

一、西南夷名称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西南地区的非华夏或非汉系的民族被称为“西南夷”^[2], 或“巴蜀西南外蛮夷”^[2], 或“蜀郡徼外蛮夷”^[3]。对西南夷的深入研究, 应当首先分析其概念、内涵及其历史演变。

有关西南夷较完整而详备的记载, 首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此篇总叙部分记载说: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 夜郎最大; 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 滇最大; 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 邛都最大, 此皆魑结, 耕田, 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 北至牂榆, 名为嵩、昆明, 皆编发, 随畜迁徙, 毋常处, 毋君长, 地方可数千里。自嵩以东北, 君长以什数, 徙、笮都最大; 自笮以东北, 君长以什数, 冉駟最大, 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 在蜀之西。自冉駟以东北, 君长以什数, 白马最大, 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西南夷族类有异, 成分复杂。按《史记》有关篇章以及《汉书》的记载, 实际上包括西夷和南夷两部分。所说“夷”, 即是《西南夷列传》总叙末句所记“蛮夷”, 是汉代对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的通称, “西”和“南”均为方位词, 西夷是指位于巴蜀以西的非华夏族的民族或族群, 南夷是指位于巴蜀以南的非华夏族的民族或族群。

指称巴蜀西南外的非华夏族的民族或族群为“西南夷”，是始见于西汉文献的称谓，在先秦文献并不如此。据《战国策·秦策一》所记载的张仪、司马错之言，蜀是“西辟（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这应当是秦国和东方六国的一致认识。《华阳国志·蜀志》也说秦灭蜀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里的“戎伯”指西南地区臣属于蜀的氏羌系和濮越系的各族君长。先秦时期臣属于蜀的族类众多，汶山、南中、僚、夔都曾先后为蜀附庸，蜀为其长，而称为“戎狄之长”，那么诸此族类无疑也就是戎狄了。先秦文献中直接提到巴蜀西南外非华夏族的民族或族群之臣属于蜀国者，仅在《战国策·秦策一》中有此一见，说明汉代所称西南夷，在先秦时代多称戎狄，这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引起的称谓变化，这种名异实同，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常见的通例。

应当指出，先秦史上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4]，都是中原诸夏对周边非华夏族的民族或族群以及一些原出华夏但已经戎狄化了的族群的称谓，是他称，非自称，是泛称，非专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或又合称为四夷[5]，即四方之夷。关于这一点，唐代孔颖达的解释最为精当。他说：“四夷之名，随方定称，则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当处立名，则名从方号。”又说：“夷为四方总号。”[6]从《左传》、《国语》等先秦史籍可见，不仅“四夷”事实上都包有大量不同的族系，其中许多族系可以蛮、夷或戎、狄互称，而且这些名称亦多随时代的变迁而异同不一。无论先秦西南地区的戎狄，还是汉代的西南夷，都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类，所说戎狄或西南夷，都是泛称，而不是一个统一或单一民族的族称。

二、西南夷与南中

《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把西南夷分为四大类别，其中包括七个区域。

四大类别的第一类是夜郎、靡莫之属和滇、邛都，属于“魑结，耕田，有邑聚”族类的所在；第二类是犍、昆明，属于“编发，随畜移徙，无常处”族类的所在；第三类是徙、笮都、冉駹，属于“或土著，或移徙”族类的所在；第四类是白马，属于“氏类”的所在。

七个区域分别是夜郎、靡莫之属（包括滇）、犍与昆明、邛都、徙与笮都、冉駹、白马。很明显，这是以文化属性、民族系统和经济类型进行分类的。夜郎、靡莫和滇、邛都文化相近，均属濮越系族类，以定居农业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犍、昆明属于游牧的羌系族类。徙、笮都、冉駹属于氏羌系族类，其中有的是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有的则是半农半牧生产和生活方式。白马则属氏类。①除白马而外，在其他每一个类别中，均包括若干区域，每一个区域内都有“以什数”的众多“君长”，分别以一个“君长”代表一个族群，以区域中最大的君长代表区域。七个区域中有六个区域有“君长”，一个区域“毋君长”。如此看来，西南夷地区至少有上百个“君长”，所以太史公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7]对于各个区域内“以什数”的“君长”，总叙只列出了当中“最大”的“君长”和主要“君长”的名称，他们分别是：夜郎、滇、邛都、犍、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其中的滇属于靡莫之属，靡莫自然也是“以什数”的“君长”之一，而犍、昆明则是“毋君长”之属。所称“君长”，当然不是君主制时代的王或帝王，而是犹如“氏王”、“白虎夷王”一类族群的酋豪或首领，其性质如同鱼豢《魏略·西戎传》所记载的“氏人有王，所从来久矣”[8]，属于仍然逡巡在前国家社会时代的部落或酋邦之长。

《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划分的七个区域，与汉武帝开西南夷所设置的犍为郡、牂柯郡、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益州郡等六个郡，具有历史、民族和文化等方面深刻的内在联系。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犍为郡包括西夔，属犍为南部；牂柯郡包括夜郎、且兰、同并、漏卧、句町等“故侯邑”；越嶲郡包括邛都、笮都、昆明等部；沈黎郡原为笮都居地，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天汉四年罢置，笮都南迁至越嶲郡之大苻、定苻、苻秦等地；汶山郡主要是冉駹居地，属于该地“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的主要部分[9]；益州郡主要是犍唐和昆明等居地。从汉至晋，西南夷郡县多有分合，其原由复杂，不过汉武帝开置此六个郡时，主要原因还是与族类和政治地理直接相关，《史记·西南夷列传》对于区域的划分亦当主要据此而来。

《汉书·西南夷传》除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西南夷君长”改为“南夷君长”外，其他

文字与之大同小异。

《华阳国志》的记载则有所不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嵩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移徙，莫能相雄长。

很明显，《华阳国志》所记载的“南中”是一个地域范围的概念，而《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西南夷”是地域与族群的概念，二者在概念上有所区别。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诸部均为“编发左衽，随畜移徙”，显系误记。按《史记》、《汉书》，滇、夜郎等均属“魍结、耕田、有邑聚”，只嵩、昆明等为“编发、随畜移徙”。所以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依《史记》文将此句增改为“或椎髻耕田，有邑聚，或编发、随畜移徙”。^[10]

第二，“南中”名称始见于三国蜀汉时期^[11]，《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至南中，所至战捷”，均可为证。南中，是用以指称蜀汉以南的地区，不属于行政建制和区划。蜀汉和晋代的南中并不是秦汉时期西南夷的全部，仅相当于秦汉时期南夷的大部分地区，而不包括秦汉时期的西夷。与《史记》和《汉书》相比较，《华阳国志》没有把徙、笮都、冉駹、白马等著录在《南中志》，而是把他们分别著录在《蜀志》和《汉中志》内。《华阳国志》之所以没有把《史记》、《汉书》的西夷以及部分南夷在《南中志》中叙录，这是因为晋时南中不包括秦汉的西夷以及南夷中的越嵩等地区。《三国志·李恢传》裴松之注说：“臣松之讯之蜀人，云庾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晋时有“南中七郡”之说，即朱提、建宁、云南、兴古、牂柯、益州、永昌等七郡，自晋泰始六年置宁州以后，乃陆续分置为十四州。

第三，《华阳国志》总叙将南中十四郡分为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嵩唐等六个区域，其中滇濮是以族类名称（滇为族称，濮为族属）代表区域，叶榆和桐师是以地名代表区域，句町、夜郎和嵩唐则分别是以族群和郡、县名称代表区域。显然，这是从区域即势力范围或地盘的角度立说，而不是从族群或郡县角度立说。^②在常璩所划分的在六个区域内，“侯、王国以十数”，侯、王国即侯国和王国，这些以十数的侯国和王国即是《汉书·西南夷传》中屡次说到的“邑君”，邑君所谓“邑侯君长”，他们多数是从属于“最大”的君长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划分的六个区域，实质上就是六个大君长及其势力范围所在的区域。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西南夷传》及《华阳国志·南中志》可以看出，汉晋之间“西南夷数反”。汉昭帝元年“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汉成帝河平二年南夷夜郎王、句町王、漏卧侯等“更举兵相攻”，夜郎王兴“将数千人”，“从邑君数十人”见牂柯太守陈立，兴被断头后，“其妻父翁指与其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这表明，夜郎王、句町王均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都是称雄称长者。以此类推，南中各地均有最大君长的势力范围，他们于是成为南中“以十数”的侯、王国的典型代表。由于这样的缘故，南中地区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以势力范围为基础的政治地理区域，这就应当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划分南中为六个区域的依据。

三、西南夷概念的演变

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酋邦社会，并不是由某个单一民族所构成的整体社会，也不是以几个族群联合形成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实体。

由于历史文献不足征，西南地区的上古史显得非常复杂而隐秘，学术界对这个地区古代社会各个族群的族属和年代等问题的看法存在相当分歧。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在对西南夷的研究中，往往只是从《史记·西南夷列传》出发，仅对“巴、蜀西南外蛮夷”进行分析，却忽略了先秦时代的

巴、蜀均属西南夷范畴这个历史事实。

历史文献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在公元前 316 年秦灭巴、蜀以前，不论巴还是蜀，都属于西南夷的范畴。《战国策·秦策一》和《华阳国志·蜀志》均说蜀为“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而《荀子·强国篇》也直接把巴称为“西戎”。《汉书·地理志》更是明确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这里的巴、蜀指秦汉时期的巴郡和蜀郡，广汉指秦汉时期的广汉郡，而广汉郡是分别从巴郡和蜀郡割地设置的，即所谓“分巴割蜀以成黔、广”（《华阳国志·蜀志》），“黔”指黔中郡，“广”指广汉郡。很清楚，《汉书》是把被秦灭以前的古巴蜀视为南夷的。《汉书》为官修史书，《汉书》把被秦灭以前的古巴蜀称为南夷，这个看法必然是代表了汉王朝的普遍意见，为朝廷所公认。这些记载无可非议地说明，在当时的中原眼中，先秦时期的巴、蜀，均毫无例外地属于西南夷中的成员。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公元前 314 年，秦置蜀郡，同时又以蜀为侯国，“贬蜀王更号曰侯”^[12]，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过渡政策。秦惠王封蜀王子通国（又作公子通、公子繇通）为蜀侯，以陈壮（或作陈庄）为相，并以秦大夫张若为蜀国守。但是，蜀地的反秦势力并没有停止反抗。在蜀郡以南的南中地区，有蜀王子安阳王率领旧部三万人伺机反扑^[13]，在青衣江地区，又有“丹、犁臣蜀”^[14]，拥戴蜀王为君长，内外接应反秦。于是，“相壮杀蜀侯来降”^[14]，此为秦惠王更元十四年（公元前 311 年）。秦武王元年（公元前 310 年），秦派名将甘茂定蜀，并诛杀参预谋反的陈壮。公元前 308 年，秦复封蜀公子煇（或作恇、暉）为蜀侯。公元前 301 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15]，令蜀侯煇夫妇自裁，并“诛其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15]次年，秦又封蜀公子绾为第三任蜀侯。公元前 285 年，秦“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15]从公元前 316 年灭蜀，直到公元前 285 年诛蜀侯绾，经过三十余年的时间，历经三代蜀侯与秦国之间的抗争与镇压，直到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285 年），秦国才最终在故蜀国建立起郡县制度。大约在此之后，蜀才从时人关于“南夷”的概念中被分离出来。^[16]

据《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粤（越）嵩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沈黎郡置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后汉书·南蛮夷传》记载：“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又载：“至天汉四年，（沈黎郡）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至安帝延光二年改为蜀郡属国，灵帝时改为汉嘉郡。可见，此汉嘉郡辖境大致上就是沈黎郡辖境，基本无变迁。沈黎郡（包括汉嘉郡，但汉嘉郡的面积小于沈黎郡）的地域范围，据《续汉书·郡国志》的记载，汉嘉郡（今雅安地区）辖有汉嘉（今四川芦山县）、严道（今四川荣经县）、徙（今四川天全县）、旄牛（今四川汉源清溪镇）四县，包含了青衣江上游和大渡河上中游地区。沈黎郡原为羌系的丹、犁二族居地，原属故蜀国的范围，即“丹、犁臣蜀”。^[14]汉武帝时因丹、犁二族之名在其地设置沈黎郡，此后沈黎郡易名，仍以蜀郡西部都尉、蜀郡属国为行政区划名称。由此可见，沈黎郡原为蜀地。

先秦至汉初，沈黎郡原为笮都夷所居，至汉武帝开西南夷后，笮都从沈黎郡南迁至雅砻江中下游今四川凉山州盐源县、盐边县和云南永胜县一带。笮都南迁的年代，当在汉武帝天汉四年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以“西部笮为沈黎郡”，即以笮都为沈黎郡郡治。但自天汉四年沈黎郡并蜀为西部都尉，而两都尉分驻牦牛和青衣后，笮都县即不再见于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汉和帝以前，蜀郡已无笮都县。至安帝延光二年改蜀郡西部都尉为蜀郡属国，辖四县，也无笮名。可见，在武帝天汉四年，笮随同罢置。可见在此之前，笮都已经南迁。

这就说明，关于西南夷的民族和地理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先秦时期的西南夷，包括了巴蜀在内，称巴蜀为南夷，而汉代西南夷的北界则向南推到了汉嘉郡、朱提郡和越嵩郡一线，汉代文献关于西南夷地理方位的记载，就是在汉武帝时期南夷的大量南迁后才基本上固定下来的。

因此，可以说，包括巴蜀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③，在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前期都可以称为西南夷地区。直至公元前 316 年秦并巴、蜀以后，对巴、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了大规模

改造，巴和蜀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一员^[16]，从此才不再被视为西南夷，而蜀郡西南部的沈黎郡在汉武帝时期才退出南夷的范围。自此之后，汉代的西南夷就仅指“巴蜀西南外蛮夷”的夜郎、靡莫之属（包括滇）、犍与昆明、邛都、徙与笮都、冉駹、白马等七个区域了。

注释

①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中的末句“皆氐类也”是对西南夷各族群族属的总体概况，认为西南夷均为氐类族群。其实，总叙中的这一句只是针对“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而言，并不是说整个西南夷均属氐类。我们只要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西南夷列传》总叙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对西南夷加以分类的，非常精当，而其中对于族类的分别也是十分明晰而准确的。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分类也是比较科学的。

②《华阳国志·南中志》总叙将晋南中十四郡划分六个区域，其中有夜郎郡，有属兴古郡之句町县和属永昌郡之巂唐县。很明显，这不是以郡或县来划分区域，否则各区域之间的地位和级别均不对等，而南中十四郡中的大多数也无从在这六个区域内安排。

③当代的中国西南地区，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和西藏；而古代所称的西南地区，则相当于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本书所谓西南地区，是指古代的西南地区。

参考文献

[1] 罗常培等. 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概况[J]. 中国语文, 1954, (3).

[2] 史记·西南夷列传[M]; 汉书·西南夷传[M].

[3]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M].

[4] 礼记·王制[M]; 史记·五帝本纪[M].

[5] 左传[M].

[6] 左传[M]. 文公十六年孔颖达疏.

[7] 史记·西南夷列传[M].

[8]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M]. 裴松之注引.

[9] 华阳国志·蜀志[M].

[10] 任乃强.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229.

[11] 三国志·魏志[M]; 三国志·蜀志[M].

[12] 史记·张仪列传[M].

[13] 水经·叶榆水注[M]. 引《交州外域记》.

[14] 史记·秦本纪[M].

[15] 华阳国志·蜀志[M].

[16] 段渝. 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J]. 中国史研究, 1999, (1).

Conception and Evolvement of the Southwest Yis in Pre-Qin, Qin and Han Period

DUAN Yu

(Center for Bashu Cultural Studi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68)

Abstract: In the documents of Han dynasty and later period, the Southwest Yis (西南夷) is the generic term for the ancient ethnic groups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edge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south and west of Bashu (巴蜀), southwest China. It is the generic term for the ethnic groups of Diqiang (氐羌) System and Puyue (濮越) System distributed in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of Sichuan, Yunnan, Guizhou and other regions in Qin and Han Period. Nan Zhong (南中) is only the main ethnic group of Nan Yi (南夷). Bashu is also considered to belong to Nan Yi in Pre-Qin period. In term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conception of Southwest Yi undergoes a change over Pre-Qin, Qin and Han Period.

Key words: Southwest Yi; connotation; time and space; Pre-Qin; Qin and Han Period

收稿日期: 2013-1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10&ZD087);

作者简介: 段渝 (1953-), 男, 汉族, 四川省重庆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巴蜀历史文化、长江流域古代文明、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